

从《物感》一书看《伊索寓言》 对中国寓言的影响

祝 普 文

人类文化的瑰宝《伊索寓言》，早自明代天启年间就传入中国。但对它的流传以及是否影响了中国寓言等问题，过去一直不甚了然。在1986年北京召开的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第二届年会上，笔者根据作家湛卢提供的线索，有幸见到一部直接掇取《伊索寓言》译义本《况义》的若干篇章，与其他创作合为一辑的寓言集《物感》一书。它的发现，证明了《伊索寓言》传入中国以后，对中国寓言创作确实产生过积极的影响。中国寓言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吸收《伊索寓言》的表现手法，更增加了自身的艺术魅力。

李世熊及其《物感》

《物感》编撰者李世熊（1602—1686），明诸生。字元仲，福建宁化人。明亡后，入山祝发，号寒支道人。清顺治初，黄道周等在福建拥立隆武帝，征拜他为翰林博士，他固辞不赴。清兵入闽，逼他做官，耿精忠起兵叛乱，遣使敦聘，他都严辞拒绝。他的气节颇得时人赞赏，一时声名大震，“虽匹夫匹妇，无不知有寒支子者。”（《清史稿》，卷501，《李世熊传》）他的后半生，除了与友人泛湖登山，怀恋故国外，一直过着隐逸生活。乡

民对他十分信赖，遇事不决，常请他裁夺。晚年自号媿庵，颜其斋为“但月”，以居檀河，世又称其檀河先生。

李世熊于六经诸子百家之言，无不贯通，尤喜韩非、屈原、韩愈的著作。其文沉雄峭刻，奥博离奇，多半书写牢骚不平之感。著有《寒支集》十四卷，《宁化县志》七卷，《钱神志》二十卷，《本行录》三卷，《经正录》三卷，以及《狗马史记》等。

《物感》一书，《清史艺文志》、《四库全书总目》均未著录，亦未收入《寒支集》，它与李世熊另一部书《史感》合为一帙，单独印行。

北京图书馆今藏有民国七年（1918）宁化修志局印《史感·物感》一书。据书前福建上杭人丘复所撰《史感序》得知，此书较早版本有光绪十七年（1891）李世熊九世孙应成所印袖珍版，印数仅百本。宁化修志局即据此本校勘重印一千册。这个印数在当时来说，不算太少。然而，数十年来，由于中国古籍浩如烟海，这部虽有价值，但卷帙单薄的编述，便一直湮没在尘封里。今天，它被发掘出来，实是文学界的一件幸事！

一部中西合璧的寓言集

《物感》，凡一卷，因无编撰者序跋，故无从断定其准确的写作年月。但分析其内容，当作于明亡以后。

此书由二十篇寓言故事组成，每篇都很生动诙谐，读来趣味盎然。最引人注目的，是它收入了明代天启年间由西方传教士金尼阁与中国文人张賡主要根据《伊索寓言》编述的《况义》一书中的五篇寓言。今将此书与《文献》杂志第24期发表的明抄本《况义》全文加以对照，就可以看出，此书中的《肉影》、《佞狐》、《狡棋》、《礼驴》、《蛙怖》五篇，分别为《况义》的第六、九、十、十六、二十二则故事。上述故事，除《蛙怖》（《况

义》第二十二则)的原始出处待查外,其余四则,均出自《伊索寓言》(参见《文献》第24期杨扬《〈伊索寓言〉的明代译义抄本——〈况义〉》一文)。

值得注意的是,《物感》作者在采掇《况义》寓言时,并不是原文照录。除了为各篇加了比较形象而贴切的标题外,还根据自己的见解和需要,对原文作了精心的改动甚至改编。先看以下一则,《况义》原文为:

一犬噬肉而跑,缘木梁渡河,下顾中肉影,又复云肉也。急贪属咬,口不能噤,而噬者倏坠。河上群儿为之抚掌大笑。

义曰:其欲逐逐,丧所怀来。戕也,可使忘影哉!
《物感》文为:

肉 影

一犬啣肉而跑,缘木梁渡河,下顾水中肉影,又复云肉也,急欲啖之,口张而原啣者坠河矣。河上群儿抚掌大笑。

世之为肉影而丧所怀来者,岂但此虎哉?

对比两文,可以看出,后者优于前者。第一,加强了通俗性。如:前者的“急贪属咬”,固然形象而概括,但换成“急欲啖之”,则顿时显得更加明白、通俗。文学作品的通俗性,无疑会增强它的普及性。第二,用词更为准确。如:后者把前者首句的“噬”改为“啣”。噬,本意为食;而“啣”是用嘴含。显然用“啣”比用“噬”更贴切。这一字之改,就把狗得肉即跑,想找个僻静角落独吞的贪馋形态曲尽其妙地表达了出来。第三,结尾警句对故事主旨的揭示,更具有普遍意义。前者的结尾警句,只是就故事本身发表感慨,有其含蓄的一面;而后者把故事含义加以引申,明确指出追求虚幻目标并为此丧失本真,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这就深化了寓言的主题,加强了寓言的社会功效。

再看下面一则，《况义》原文为：

乌栖枝啄肉。狐欲夺肉，诡谀乌曰：“人言黑如乌，乃濯濯如雪，是堪为百鸟王。但未闻声如何？”乌大喜，噓然而鸣，肉下坠，狐遂得肉。

又曰：人面谀己，必有己也。匪受其谀，实受其愚。
《物感》文为：

佞 狐

乌栖枝啄肉。狐欲夺肉，诡谀乌曰：“人言黑如乌，乃濯濯而雪，是堪为百兽王，但未闻声如何耳？”乌大喜，噓然而鸣，肉下坠，狐遂得去。文雉遇狐而叱之曰：“反黑为白，割肉之贼！”孔雀遇乌而笑曰：“饱人之谀，味不自濡。”

前者用警句做结尾，后者却改用对话做结尾。前者旨在嘲笑受谀乌鸦的愚蠢，后者重在斥责靠颠倒黑白窃取实利的狐狸的奸佞。后者的讽刺锋芒，首先对准的不是受愚弄者，而是愚弄他人者。这么一改，端正了讽刺武器的投射方向，使应当受到鞭挞的形象，受到了鞭挞。

可见，《物感》编撰者对《况义》寓言所作的改动，都不同程度地提高了原作的质量。

除了采掇《况义》中的五篇寓言外，《物感》其他十五篇寓言中，已明确是改写或抄掇他人作品的有《效鹄》（见元陶宗仪《辍耕录》卷26，《雕传》）、《鼯市蜃阁》（见明冯梦龙《古今谭概》，《非族部》）、《老虫》（见明江盈科《雪涛小说》，《鼠技虎名》）、《佛猫》（见明浮白主人《笑林》）四篇，余下十一篇究竟是李世熊自撰，抑属掇拾他人之作，尚待进一步考察。但这十一篇均为中国寓言，是可以肯定的。

《物感》的寓言，从其思想内容看，它们都不是酒余茶后，

信笔一挥，聊供消闲释闷的游戏文字。例如：《礼驴》嘲谑了那班“凭尊位”者的顽劣，维妙维肖地把他们比作驮着庄严物象的驴子；《老虫》笑骂那些“高冠大剑，秉钺杖藜者”不过是一群徒有烜赫虚名的鼠辈；《蹇驴》揶揄见利忘命的走狗；《凭虎》讥消“倚势作威，荣施一时，终获作灾”的鹰犬；《旷猫》讽刺贪赃枉法的官吏；《蝙蝠》鞭挞充斥社会上层的两面派。由此可见，《物感》的寓言都是编撰者触物生感，以物喻人，针砭现实，讥弹当时统治阶级和各种腐朽、丑恶现象的有激之言的艺术记录。从文学角度看，《物感》的寓言篇篇都是精采的文学短篇，不少是广泛流传的名篇。它们所描绘的驢、拙蚓、贪猫、狡狐等艺术形象，性格鲜明，情态各异，栩栩若生，读起来如见其貌，似闻其言。每篇故事虽然短小，却一波三折；设喻恰切、含蓄；语言幽默、辛辣。全书尽管由不同国度的作品汇编而成，但风格十分相近；中西寓言，情采纷呈，联璧同辉。

《物感》是一部中西合璧的优秀寓言集。

《物感》的价值

中国寓言中有些曾受印度寓言的影响，已有确论，但是否受过古希腊寓言的影响，却一直没有找到实证。《物感》一书的发现，解决了这个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它说明，《伊索寓言》这株文苑奇葩自引入中国以后，很快便被中国的文学家嫁接成活，并迅速生长起来，结出甘美的果实。只要读一遍《物感》，就会产生这样的鲜明印象：它除了直接采录《伊索寓言》译义本《况义》那五篇寓言外，其他寓言的表现手法竟与《伊索寓言》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而且又顽强地透露出中国寓言的风格和气派。

拟人化是《伊索寓言》的显著特点之一；拟人化寓言约占《伊索寓言》的百分之八十。这就与中国寓言不同。中国寓言虽然也

有不少拟人化寓言，但从目前已经发掘整理出来的寓言看，人物寓言所占比重较大。其原因殆与中国长期受儒家倡导的“不语怪、力、乱、神”的僵化思想统治，限制作家丰富想象力有关。而《物感》的寓言别开生面，全部采用拟人化手法写成。《物感》是一部纯粹的动物寓言集。《物感》的这种表现手法，摆脱了以人物寓言为主的中国寓言的传统风格，这不能不说是借鉴《伊索寓言》的结果。

但是，《物感》绝不是《伊索寓言》的仿作。作为一个有着高深文学造诣和修养的文学家，李世熊显然认真研究过中国传统寓言，在此基础上，吸收了《伊索寓言》的长处，编撰出融会着中西风致的寓言。这寓言，有着《伊索寓言》的美丽外壳，而内核却透露出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首先，它的主题思想蕴含着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沉思。《伊索寓言》虽然也有些故事表现了对强权的轻视和讽刺，但这类故事并不多，大量的是揭示生活哲理、人类道德的故事，政治色彩不浓。而中国寓言的最显著特征，是它具有强烈的政治性，有时是曲折地、含蓄地，有时却是直接地、赤裸裸地讽时刺世。《物感》的所有寓言，正是如此。其次，《物感》的寓言，鲜明地表达着富有中国特色的古老的哲学思辨。如《老虫》一则，就是以中国古代“名实相怨”思想为理论概念所结构起来的寓言。这类寓言在中国先秦诸子寓言中可以找到许多，而在《伊索寓言》里面却是找不到的。第三，《物感》所采取的拟人化的表现手法带有中国浪漫主义的色彩。《伊索寓言》所描写的动物是自然界实有的动物，而中国寓言的动物形象，虽然也以现实动物为模特，但往往奇妙地创造出某些自然界里根本就不存在的理想的动物形象来，如神龙、祥凤、独脚夔，等等。《物感》里面就出现了好几种，如：伴随着兵戈纷争而显形的昭明，宽广得不知几百里的鼃，吐气成阁、令飞鸟迷坠的蜃，以及连字书编纂者也搞不清其形貌的蜃。彼等在动物分类范

畴中究竟属何门、何纲、何目、何科……只有天晓得！这些“动物”盖属中国特产，源于中国璀灿的古代神话和民间传说，其被请入《物感》中，大大增强了寓言的寓味，“浪”味，土味，使它更富有了诱人的艺术魅力。凡此种种，都说明《物感》的编撰者对《伊索寓言》不是采取简单的拿来方法，而是将其优点与中国传统寓言之长处综合起来，为己所用。这为文学艺术的继承和借鉴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物感》的被发现，无疑补充了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内容，对当今风靡于世的比较文学的研究，也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作者工作单位：吉林省艺术学院

《秘传外科方》作者考

日本丹波元胤编《中国医籍考》卷七十一《方论四十九》说：“亡名氏《秘传外科方》一卷，存。”今人张赞臣编著的《中医外科医籍存佚考》也说：“《秘传外科方》1卷，现存。撰于明代，作者亡名氏（见《医籍考》）。最早版本为明洪武刊本。”按：明高儒《百川书志》卷十《子部·医家》著录：“《仙传外科集验方》一卷，《秘传外科方》一卷，《徐氏胎产方》一卷，《济阴方》一卷，《李尚书济阴方》一卷，《胡氏小儿方》一卷，《小儿疹痘方》——鄱阳魏君用编述。”《存佚考》中《现存医学书目总目》没有收录《百川书志》，所以遗漏了《仙传外科集验方》一种。自然也不知道《秘传外科方》作者是江西鄱阳人魏君用。《存佚考》把《秘传外科方》列入明代著作这是值得商榷的。《百川书志》凡是明人著作均冠以“皇明”、“皇朝”或“大明”的字样，否则就不是明人的。据此体例，魏君用就不是明人。他的《秘传外科方》最早版本现存的为明洪武刻本。那末，魏君用应当是元代人，说不定还有元刻本呢。

· 官桂铨 ·